

## 张申府的哲学思想

张岱年

张申府是当代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原名崧年，以字行。在 20 年代张申府曾参加新文化运动以介绍罗素哲学而知名。中国共产党初建，张申府曾参加建党活动，是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1924 年曾在黄埔军校任职。1931 年至 1936 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1935 年因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后经冯玉祥保释出狱。而反动当局授意清华大学把张申府解聘了。在 30 年代的哲学界张申府有一定影响当时郭湛波编著《中国近三十年思想史》(再版改为《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曾列专章论述张申府的思想同时列为专章的有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等)认为张申府是唯物论的主要代表之一。抗战时期，张申府在武汉、重庆等地参加救亡民主运动，1945 年胜利后回北平。1948 年昧于解放战争的形势应《观察》杂志之邀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错误文章受到革命同志的严厉批判，于是在学术界销声匿迹达三十多年。解放后受周恩来总理的照顾，受聘为北京图书馆研究部研究员。1979 年以后，年近九十，始出来参加一些学术界的活动。1986 年因病逝世。

张申府的著作有《所思》(1933 年,1985 年重印)《张申府学术论文集》(1985 年),《罗素哲学译述集》(1989 年),《思与文》(在排印中)等。

## 一、解析与唯物

张申府赞扬唯物论，又深喜罗素等人的逻辑分析方法，于是主张将唯物论与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一般所谓分析，张申府称之解析 这是沿用解析几何的传统译法。他在所写《现代哲学的主潮》中说：“现代世界哲学的主要潮流有二：一为解析 详说逻辑解析；二为唯物 详说辩证唯物。”（《张申府学术论文集》66页）关于现代世界哲学的主潮，学者所见可能不同，有的人可能举出生命哲学、唯意志论等。张申府则认为是“一为解析 二为唯物”。这就是肯定罗素、穆尔的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是最重要的思潮。他论述解析与唯物的异同说：“逻辑解析不免要有所分，照例是根据原子论的观点的 而辩证唯物则侧重于全 于变 于事象的相关关联。以此方法的偏重，解析与唯物似乎是相反的。但相反者常相间，解析与唯物虽有的地方似相反 相通之处也不在少。”最近世界哲学里两个最有生气的主潮是可以合于一的；而且合一，乃始两益。而且合一，乃会辩证之理。在理想上，将来的世界哲学实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论文集》第 60—67页）这样 他提出了关于“解析的辩证唯物论”的构想。可惜的是 他只是提出这一设想 而未能在理论上实现这一设想。

在许多理论问题上 张申府是赞同唯物论的。如关于“事理”关系问题 他认为：“理不在个体 而在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 理可离个体但不离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他引证德国逻辑学家舒尔慈的话说：“一个性质 只有在有一个东西存在可以这个性质谓之时 才存在；同样，一个关系，也只有在有一个东西存在可以这个关系谓之时 才存在。”这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并指出 关于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数理逻辑是偏向唯名论的。这所谓实在论指共相实在论。与共相实在论对立的唯名论乃是唯物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张

申府自称 我自己也是唯名论者(《论文集》第 62 页)。

张申府又写了《客观与唯物》、《唯物论的重要》等文表述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辩证唯物论乃是一整个的哲学系统 既有它的方法态度 也有它的元学、知识论 更有它的人生观人生哲学。它的最根本义则在认有不依附人的客观实在。”(《论文集》第 63 页)又说：“现代唯物论的要义实在不只在说物是根本。……但心或思想不过一种组织复杂或高度发达的物质的作用或表现，是久已有人说过了。至于生是什么，我在八九年前为解决生力论与机械论的多年纷争，根据罗素与现代数理逻辑等的重视结构，曾创‘结构论’大意就是 有生无生在于结构的不同。我深自信是一个先觉的预言”(第 121 页)但是他虽然提出“结构论”的观点 却未做出充分的论证。

张申府在宣扬“唯物论的重要”的同时，也肯定人的改造物质的作用 他说：“人生是有意义的 人生是有价值的。只是这种意义、这种价值，一半在物质上，一半在改造物质上。人是物质 人也是改造物质的。”(《论文集》第 122 页)这也是一种辩证观点。

## 二、纯客观法与具体相对论

张申府提出关于思想方法的两种观点 其一 纯客观法 其二，具体相对论。这是他自己的关于思维方法的独到的心得。他的“纯客观法”的程式是：“跳出主客 主亦为客 是为纯客。纯客所证 厥为事情”。意思是说，讨论问题 各有所见 于是有主客之分。要超越主客的对立，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观察主客两方，于是主亦成为观察的对象 这样就能达到纯客观的真理。所谓‘纯客所证 厥为事情’意谓‘由纯客观法所得的元学应是一切皆成自事情。’在 20 年代 罗素与怀特海却讲‘一切皆事(event)’。所谓事 有人译为事素 申府译为事情。

所谓纯客观法其实是消除主观成见的方法。古代宋研、尹文讲“别宥”荀卿讲“解弊”都是试图超越主观成见 惜申府没有引证宋荀之说。

1945年，张申府发表了一篇《我的哲学的中心点——具体相对论》表明他自己的哲学观点。这所谓具体相对论的主要含义是：“一句说话，一段论断，甚至一种理论或学说，在一般情形下，要断定它们的对与不对，或是不是真理，都要看它是照哪种意义，作怎样解释，为什么问题，在什么范围，就什么或哪方面或哪点说”。（《论文集》129页）也就是说：“一句说话，这样解释，在某范围，就某方面说，可以是对的，但是换一样解释，或出了那个范围，就另一方面说，也许就错了”。（130页）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很深刻的，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而其实是列宁所谓“真理是具体的”的阐释。申府自己也说：“在我三年前初讲它时，我曾把列宁常喜称道的黑格尔的两句话作为题词，那两句话就是“真理是具体的，绝对是相对之积”。（128页）

纯客观法其实即是唯物观点。申府说：“客观的本义，本在如实地观，不以情欲好恶而谓黑为白。客观者是承认有公共世界，承认实在是依附于人的。辩证法唯物论的根本义便也在此。”（《论文集》第63页）而具体相对论是辩证法的运用。

张申府非常重视辩证法，他曾经提出不同于实证主义者孔德的人类思想发展的三阶段说。孔德认为，人类思想的进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的，第二阶段是玄学的，第三阶段是实证的。申府认为孔德的分法已不适当了，“到了今日，仍然还可以分成三段，但已应是：1. 有灵论的；2. 机械论的；3. 辩证论的。”（同上77页）他如此划分人类思想发展的阶段足见其对于辩证法的高度重视。

### 三、对于罗素哲学的评论

张申府非常敬仰罗素,1914年阅读罗素所著《我们的外界知识》,深感兴趣,开始醉心于罗素的研究,并翻译一些罗素的文章。罗素逝世之后,1983年,申府写了一篇《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作为对于罗素的纪念。文章中说:“我敬佩罗素,敬仰罗素,最主要的是他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数理逻辑,深深地吸引了我。……一个大哲学家必然知识渊博,必然有所创辟,必然深切关心人生问题,而且有一个新的高尚的人生观或人理想,这三个条件,可以说罗素无一不充分具备。综述罗素的一生,他不仅是位伟大的哲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理论家。他拥护正义自由,显扬科学理性,反对纳粹法西斯,对中国一往情深。尤其应该说,罗素以他伟大的造诣,开创了世界的哲学新潮流,是数理哲学的一代硕师。”(《罗素哲学译述集》卷首)

罗素早年的哲学曾被称为新实在论,在所著《哲学大纲》中曾自称为中立一元论。张申府曾评论新实在论说:“实在论其实就是现代唯物论的一个意义,列宁特别注意的一个意义”(《论文集》<sup>122</sup>页)但也承认罗素曾经是怀疑论的代表。(86页)同时指出:“罗素一生讲学,直至今日为止,自也不能无所缺欠。主要的就是:一来甚重视生物学);二来没有了解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论。这当然是由于社会时代、思想习惯的限制”(《罗素哲学译述集》<sup>230</sup>页)这是认为罗素不了解辩证唯物论是一个缺点。申府又认为,“罗素绝不是唯心论者,……也绝不是实证论或现象论者,这也是别有明文可证的”。(同上<sup>234</sup>页)同时又说:“罗素也是仁智勇兼之者,一生有许多可以钦佩景仰服膺的地方,也就是因为他在观点看法见解上有许多与唯物论接近的地方。”(《论文集》第120页)从张申府对于罗素的评论看来,足见他虽然崇仰罗素,但还是认为辩证唯物论具有更高

的理论价值。

3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曾发生所谓“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些人反对辩证唯物论，认为唯物辩证法是违背逻辑的，是不能成立的。一些进步人士则宣扬唯物辩证法，而认为形式逻辑就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毫无价值的。这两派各有所偏。张申府既提倡形式逻辑，讲授形式逻辑，又高度宣扬辩证法，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区别开来。当时张申府的观点是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直到50年代才正式解决。学术界既肯定了辩证法的真理价值，又承认了形式逻辑的科学意义。

张申府就是我的长兄，我青年时期初习哲学，曾受到申府的引导。我从事哲学思维，也是从阅读罗素原著《我们的外界知识》开始。后来我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也受到了申府的指引。张申府宣扬了很多比较正确的哲学观点，都没有写出专著来。他在九十岁时曾慨叹：“我吃亏在于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但后悔已晚了。罗素一生写作极勤，著作丰多。申府敬仰罗素，却未能学罗素的勤于写作，这是值得惋惜的。今天来看申府的遗著，还应承认，在30年代，申府对于哲学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1993.6.17.

## 这件事得感谢申府先生

于光远

有一件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产生了相当重要影响的事，我得感谢申府先生。

这件事的经过是：1935年夏天我‘参加革命’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一点零零碎碎的认识，对这有比较深一点的认识，是在1936年上半年阅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之后。在一二·九运动时，清华的革命同学都知道申府教授是支持我们的。听说一二·九那天，申府先生虽然没有同学生一起游行，却进了城，在一个临街的饭店楼上观看学生们的示威。1936年上半年，是我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由于对申府先生思想和人格的敬仰，我选了一门他讲授的“形而上学”。这门课每周只有两小时。在课堂上，他常常离开课本去讲时事，把启发学生去搞抗日救国的觉悟看得比传授形而上学的知识、讲自己的哲学观点更为重要。虽然如此，我还是在课堂上听他讲物质、意识、时间、空间、讲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等等。我这里要讲的一件事，是申府先生为学习这门哲学课的同学开了一张十几本参考书的单子，在这张参考书单子里就列有上面说的恩格斯和列宁写的那两本书。在当时沾上了一个“马”字就会受到迫害的国民党统治区，（当时听说有一个学生因为手持一本《马氏文通》而被拘捕）申府先生把这两书列为参考书，是很要有一些勇气的。清华大学的规矩，教授们开的参考书，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就把它们从书库里取出

来，同学们看这些书非常方便。我就在图书馆把这两部博大精深、逻辑严密、论辩尖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巨著（英译本）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那时我的水平当然很低，但阅读之后还是使我一下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它的信徒，一直到今天。我真不知道当时如果没有申府先生指定这两本书作为参考书，那我将会在什么时候读到它们。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必须感谢申府先生。

还有一件事，想顺便写一下。

1938年初，申府先生从北平到汉口，同时沈钧儒先生也从上海到这个城市。南北救国会的两个领袖在汉口谈判决定团结起来，成立一个“抗战建国协进会”。这个会的成立大会在汉口一品香西餐馆举行。我作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的负责人被吸收参加这个会，出席了这个成立会。会上南北救国领袖发表演说，在申府先生的演说中指出“抗战建国协进会”不是政党也不是群众团体，他的性质是“政团”。我不懂他说的“政团”是什么东西。“抗战建国协进会”后来在重庆改为“抗战建国同志会”后又改为“民主政团同盟”。最后改为“民主同盟”即现在的民盟。在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对“政团”一词作了一个解释，它是由政党和团体联合组成的，因此从政党和团体两个词上各取一字组成“政团”一词。这个解释同申府先生在汉口讲的不是一个意思。我一直想问一下申府先生的本意何在，有一次见到他时，没有来得及问他，现在恐怕是无法明了了。

申府先生一生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建国后，他的遭遇我是同情的。有一年五四纪念，五四运动参加者，九个老人出席了一个会议，发表了谈话。那次申府先生没有出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我了解到那时他并没有生病，而是没有被邀请，对这我很不以为然。我最后一次见到申府先生，还是在一个图书馆工作的会议上，在北图旧址。

## 张申府先生的哲学精神

李维武

张申府先生(1893—1986)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哲学家。与同时代的一些著名哲人不同,张先生并不锐意营构哲学体系,更没有去苦心创作鸿篇巨制,他所留下的是许多言简意深、亦理亦诗的哲学短篇。然而,正是在这些篇章中,记录了他的追求与思考,灌注了他的理想与激情,凝结了他的爱与恨,从而孕育了一种新的哲学精神。这种新的哲学精神的基本点是:在“解析”与“唯物”之间、西学与中学之间、逻辑与诗之间,寻求一种结合点,由此而融会古今中西哲学的精华,创造出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现代形态中国哲学。张先生的哲学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发展中国哲学,可以说仍然富有启发性。

### “解析”与“唯物”的结合

张申府是中国把逻辑主义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的第一人。早在五四时期,张申府就开始与这两大哲学思潮相接触,并深受影响。他认真研读了罗素的哲学著作,对罗素所倡导的逻辑分析方法十分信服;他又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较多的了解。30年代,张申府明确提出:“现代世界哲学的主要潮流有二:一为解析,二为唯物。”<sup>①</sup>逻辑主义分析哲学,开创于佛莱格,大昌行于罗素,为剑桥学派与维也纳学派进一

步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则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 至本世纪经过列宁的努力 益大恢宏 成了改变世界的利器。

从哲学的传统、旨趣与思路看，这两大思潮可以说迥然相异。特别是在本体论问题上，两者间表现出巨大的相斥性。逻辑主义分析哲学强调拒斥形而上学，而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重视本体论。但张申府没有停留在这种不同点上，而力图寻找异中之同 将两者沟通起来。

张申府认为，逻辑主义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成为现代世界哲学的主潮，最根本一点，就在于它们都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在科学中 科学方法是最重要的了。他说：“有一种新学说，必先有一种新方法。”<sup>②</sup>因此，“科学的重要尤不仅在它的结果 尤在所谓科学方法”<sup>③</sup>。只有提出了新方法，才能产生新哲学。

在张申府看来，“罗素对于哲学最伟大创辟的成就贡献，造时代而且千古不磨的成就贡献，也就在他的新方法，而不在他先年提倡的什么新实在论，或以后鼓吹的什么逻辑原子论，绝对多元论，以及中立一元论。具体言之 就是在他的数理逻辑 逻辑解析 以构代推；与夫也是由弄算数与逻辑而得的摹状论（包括所谓不全记号 逻辑构作）尤其是类型论 逻辑诡论的解法）以及他总在利用的一件利器‘欧坎薙刀’（通译为‘奥康的剃刀’——引者注）还有更常常称道的一种精神‘健实的实在之感’。”<sup>④</sup>这种重视名理、解析的方法，实是哲学中的科学方法。这种科学方法，不仅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而且奠定了新的科学哲学的基础。为了说明这一点，张申府把休谟与罗素作了一个有趣而深刻的比较。他认为，休谟与罗素都是对现代哲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但他们对哲学发展的作用并不完全一样：“如说休谟是最哲学的哲学家，罗素便是最哲学而又最科学的科学哲学家。”<sup>⑤</sup>所谓“最哲学的”是指最辨析精微，最能运用“奥康的剃刀”摒弃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各种实体概念 从而最无成见、最无执着。在这一点上 休谟与罗素具有共识，

都有贡献。所谓“最科学的”是指最切实、最客观。在这一点上，休谟怀疑归纳方法的合理性，动摇了科学的基础；罗素则以解析为哲学中的科学方法，强调实证精神，力图为科学确立稳固的基础。由是观之，罗素哲学远胜于休谟哲学。

张申府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他说：“现代唯物论的重要本在它是方法，本在它是实践的，本在它大有助于实践，本在它是大可用的方法，本在它是用来可以大有效验的利器。”<sup>⑥</sup>“唯物辩证法即是实法，承认实在、接近现实、注重实践、研究事实、解决实际问题，自当唯它是赖。”<sup>⑦</sup>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是一种重实在、重实证、重实践的方法，指出了“人所需处理的物事本是摆在那儿的，人的一切动作云为，都有其物质因缘，社会限制，历史背景，经济生活的条件”；“人既也是一种物质力量，而且也有其精神力量，也有其理想力量，人的理论就也可以成为一种物质力量”；“对于世界，不在种种地加以解说，而在改变之”<sup>⑧</sup>。这种科学方法对于 20 世纪中国来说是迫切需要的。他说：“变动的时代斯生变动的科学。御变动的时代与变动的科学，斯需变动的方法。此现在唯物辩证之法之所以最为贵。”<sup>⑨</sup>据此，张申府不同意孔德把人类思想发展划分为神学、形而上学和科学三个阶段，认为这种划分是 19 世纪的看法，已经过时。他主张把人类思想发展划分为有灵论、机械论和辩证论三个阶段，认为只有把唯物辩证法作为现时代思想的代表，才能真正反映新的时代精神和新的思维水平。

张申府指出，逻辑主义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方法，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解析的目的在把思想、把言辞弄清楚，藉以见出客观的实在。唯物在承认有客观的实在，而由科学的方法，革命的实践，本着活的态度，以渐渐表现之。”<sup>⑩</sup>两者的不同点在于：“逻辑解析不免要有所分，照例是根据原子论的观点的；而辩证唯物则侧重于全，于变，于事象的相关

关联。”<sup>⑪</sup>从这一点上看，似乎解析与唯物相反，而实则正相通互补，既可克服逻辑解析的割裂破碎之弊，又可匡正辩证唯物的笼统模糊之弊。“解析而辩证唯物，可以不至于茫无归宿。辩证唯物而兼解析，也庶几免掉粗略或神秘。”<sup>⑫</sup>因此张申府提出：“最近世界哲学界里两个最有生气的主潮是可以合于一的；而且合一，乃始两益而且合一乃合辩证之理。在理想上将来的世界哲学实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sup>⑬</sup>他断言：“解析与唯物这是两方方兴的趋势。两势会归必然于人类思想的改造世界状态的变更均大有所成就。”<sup>⑭</sup>

张申府的“解析”与“唯物”相结合的主张体现了他的哲学精神的一个方面。在他看来，当中国哲学家吸取西方哲学精华、创造自己的新哲学时，不应把自己囿于某一哲学传统或思潮之中，而应有一种兼融会通不同哲学传统与思潮的大气魄。这是张先生高于同时代不少哲学家的地方。张先生的这种哲学精神，以及他对逻辑主义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两大思潮之关系的独到的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二、西学与中学的融会

张申府在研究与汲取西方现代哲学成果的同时，没有忽视对中国传统哲学精华加以发掘与继承。他力主融会贯通中西哲学，来创造新的中国哲学；认为不论是固守中学还是照搬西学，都不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正道。

在张申府看来，一种哲学，既是一个时代的思想精华，又是一个民族的智慧结晶，不仅体现着时代精神，而且体现着民族精神。因此“哲学有党派性是不容否认的。哲学有民族性也是不容否认的。”<sup>⑮</sup>要创造新的中国哲学，就应当肯定并重视它的民族性。不

重视哲学的民族性，或根本否认哲学的民族性，是不可能实现这种创新的。

怎样使新的中国哲学具有民族性呢？张申府认为，很重要一点就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加以发掘与继承。他感慨地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它可以纪念的东西，则不但不会长久，也必不值得长久存在。”<sup>⑮</sup>相反，“一个民族，如果知道它自己文化上的成就，认识它文化上的代表人物，总可以增加些自信，减少些颓唐奴性。”<sup>⑯</sup>要使新的中国哲学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体现，就应当珍视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和哲学遗产中那些“可以纪念的东西”，把这些思想成果作为新的中国哲学的活水源头之一。

他进而指出，不论是古代希腊，还是古代中国，都有过自己的伟大哲学创造。“古希腊之伟大，太史公谓水为万物原，闭他卧刺以数为万物宗，额拉吉来图言‘万物流’而持正负错综相反相成，张多元，贵经历，芝诺非动，立归妄，证时相对，波罗达哥拉称‘人为万有之量衡，但当万有有时’，德谟谟利图归万物于原子，今世科学皆返之。中国周秦也伟大：有易与墨经，有仲尼之仁，惠施公孙龙之辩。”<sup>⑰</sup>不应当只看重西方哲学家的贡献，而菲薄中国哲学家的成就。

当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有自己的传统与特长。张申府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特点表现为：“不在其以天人合一为归，乃尤在其开始即不把天人强为割裂，因此也不强作人生哲学与宇宙论之分”<sup>⑱</sup>。在中国哲学家那里，天与人、宇宙与人生始终都未曾割裂开来，对置起来。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很大不同。由此出发，中西哲学在思维方式上也各有特点：中国哲学家强调统一性与贯通性，持整体思维方式；西方哲学家则强调多样性与分析性，持原子论思维方式。“一与通是东方哲学之特点。多与析则西方哲学之所擅。”<sup>⑲</sup>而这两种思维方式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有自己的独特贡献。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最大贡献是“仁”，西方哲学思

维方式的最大贡献是‘科学法’。张申府说：“‘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sup>10</sup>因此，中国哲学有自己的特点与思维方式，决不是一件坏事。

张申府又对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作了阐释，认为这一基本精神集中体现在“仁”“易”“生”三个字上。他说：“仁、易、生是中国哲学中三个最根本紧要的字，而实是一体的。生生之谓仁。生生之谓易。仁者生之仁。易者生之性。离仁无生。离生无易。离生也何用仁。离仁易息。易息，一切休止。”<sup>11</sup>“仁”“易”“生”三者的统一，可以说包涵了中国哲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部理解，体现了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根本态度。这就是：“有见于易，识生之要，而仁以行之。”<sup>12</sup>即重视宇宙的运动，追求生命的意义，而将这种仁的精神贯穿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之中。这样一来，“中国哲学的出发点确实是活的”；中国哲学所见的生活，乃是熙熙融融为其象，而实大刚健为其体。<sup>13</sup>这就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这种基本精神，是合乎辩证法与唯物论的。

张申府认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当推孔子。在他看来，孔子哲学思想，无疑有其糟粕的一面，在历史上曾产生过消极的影响，主张尊孔复古在 20 世纪中国是行不通的；但决不能因此而抹煞其精华的部分，否定它对人类文明的积极贡献，用“打倒孔家店”的过激态度对待孔子。他说：“无论如何，孔子是最可以代表中国的特殊精神的。那么，为什么不应发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而只乃对于过去的误用，徒作幼稚的反动？”<sup>14</sup>孔子所讲的“仁”与西方哲学家所讲的“科学法”虽不相同，各有特色，但亦有相通之处，就是二者都本不外乎“诚实”二字。孔子所主张的“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实际上所反对的就是培根所要破除的“种妄，穴妄，市妄，戏妄”四假象。

张申府认为，中西哲学各有其特点与思维方式，两者正好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他主张：“于多见一，由析达通，一不忘多，析而以

通为归宿。”<sup>⑧</sup>新的中国哲学，应当兼综两类思维方式之长，而不应偏执于其中的某一类。但“哲学最后目的只是一个通字。看得到，想得开，说得各得其当，使得各得其所，恐怕就是罗素所说以解析为本质的哲学最后也不过如此。”<sup>⑨</sup>

由此出发，他向中国哲学界发出了呼吁：一个为现代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家，必须善于融会贯通中西哲学，以熔铸能体现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新的中国哲学。他说：“现在中国需要种种。而其中之一必是中国的哲学家。所谓中国哲学家者，一不是中国哲学史家。二也不是住在中国的治西洋哲学的人。三更不是抱残守缺食古不化之伦。今日中国所最需要的中国的哲学家，必乃是有最新最切实的知识，认识中国哲学的特色精义，而发扬之，而履践之，而参照中国的哲学，而指出中国未来应走之路者。”<sup>⑩</sup>这一见解比之同时代一些哲学家的“新瓶装旧酒”或“旧瓶装新酒”之论，要深刻得多。即使今天读这段话，仍可以感到一种撼人心弦的力量。

这种融会西学与中学的主张，构成了张申府的哲学精神的另一重要方面。它启示我们：要创造新的中国哲学，既应当汲取西方哲学的积极成果，又应当珍视自己的哲学传统与哲学遗产。没有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引入，中国哲学不可能迅速地由传统形态转换为现代形态，成为现代世界哲学发展的一部分；而中国哲学要在与世界哲学的联系与交流中保持自己的风格与特色、生命力与影响力，并为世界哲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极重要一点，就必须依赖于自身的传统的启迪 就必须尊重、发掘、承继、阐释自己的传统。离开了中华民族二千年的哲学传统与哲学遗产，所谓创造新的中国哲学只能是一句空话。

### 三、逻辑与诗的共存

逻辑与诗，是现代哲学中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逻辑主义分析哲学强调逻辑在哲学中的意义，认为哲学的任务即对科学的陈述进行逻辑分析，用罗素的话说：“逻辑是哲学的本质。”<sup>②</sup>至于形而上学与诗，却没有任何表述经验事实的作用，无所谓真与假，因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在人文主义哲学看来，人所面对的是意义世界。对于意义世界，不能用科学逻辑来进行确定性的论证，而是要通过思与诗来说明。海德格尔说：“诗，是存在的神思。”<sup>③</sup>可以说，一切思都是诗的活动，而一切诗都是一种思。只有通过思与诗，人们才能真正揭示出意义世界的存在。

张申府十分赞同逻辑主义分析哲学，对逻辑分析十分重视。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排斥诗的作用，主张在哲学中应使这两者共存。哲学离不开逻辑，也同样离不开诗。

在张申府看来，哲学之思，依靠逻辑分析能使之精确，表达于诗则能使之传神。特别是中国古代诗歌，可以寓深邃的哲理于其间，往往本身就是哲学之思。即使是罗素这样的逻辑主义分析哲学大师，也对中国古代诗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罗素在《神秘主义与逻辑论集》一书中就曾引用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罗素认为这首诗“既不偏于古，又不颇于来之概，为西洋好战的空气里所罕有”<sup>④</sup>。至于张先生自己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更为喜爱。他说：“我以前极喜欢两个人：李贺与杨椒山。”<sup>⑤</sup>又说：“有两首诗我总不能忘。”<sup>⑥</sup>一是：“问尔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渺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二是：“春竟归何处，年年说送春。可怜春自在，送尽古今人。”这两首诗通过自然与人事的对比，表现出一种超越的情趣和对永恒的追求，蕴含着哲学之神思。

正是这样，张申府更喜爱以哲理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的《所思》一书通篇都以哲理诗的形式来讲哲学，将思与诗圆融为一体。这在 20 世纪中国哲学著述中，可谓别具一格、独树一帜。在诗的意境中，他倾诉着自己对宇宙人生的种种思考与体验，讲述了自己的追求、希望与终极关怀。读起这些哲学诗，仿佛感到思之泉从作者心灵中直接涌流而出，自然而又深刻，清新而又隽永，充溢着宇宙，敲击着读者的心灵。在这里，张申府显示了与逻辑之力迥然相异的诗之力。

值得重视的是，张申府善于把一些艰深的哲学问题，以哲理诗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本体与现象、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作为 20 世纪中国哲学所探讨的重大问题，受到张申府的高度关注。但他没有像同时代的一些哲学家那样，用长篇大论去阐释自己的见解，而是用哲理诗作了简明而深刻的表述：

社会问题在由现实以达理想。

哲学元学问题在由本体以原现象。

尝想，难不在建理想，而在由现实以达之。

难不在见本体，而在把现象都有个安放。

其实，但能实践，理想不外现实。

但能客观，本体即在现象。<sup>④</sup>

在这里，他凸出了实践在现实与理想间的意义，强调了客观地把本体还原为现象，从而对本体论问题作了新的理解。

这种逻辑与诗共存在的主张，是张申府的哲学精神的又一重要方面。这一主张尤能体现张申府的哲学气魄：既吸取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又承继中国古代哲学的诗性智慧；既肯定了科学主义对逻辑的高扬，又不否认人文主义对诗的看重。自严复以来，由于科学主义的影响，中国哲学界一直重视逻辑的意义，而很少考虑